

北堂书及其研究利用:历史与现状

李国庆 孙利平

本文所说的北堂书,是指国家图书馆接收、保存的原北京西什库教堂图书馆的外文藏书。据惠泽霖^①的《北堂图书馆史略》和方豪^②的《北堂图书馆藏书志》,这些书在历史上曾分属北京东、南、西、北四个教堂和外省教堂及个人。其中南堂历史最久,由利玛窦^③建于1605年。南堂遗留下来的图书包括利氏藏书、金尼阁^④遗书(即所谓的明季西书七千部),以及后来收藏的图书。东堂是葡萄牙耶稣会在北京的第二所住堂,1655年建立,当年寄住的教士多供职钦天监,并富于著述,藏书不少。北堂是法国耶稣会士于1693年建成的,当年藏书为四堂之冠,亦最有价值。西堂是遣使会教士所有,但耶稣会以外的教士都寄寓在此。教廷专使嘉乐^⑤主教1720年来华时带来许多书籍,皆赠于西堂,从而建立了其图书馆。这些内容极其广泛的早期西文图书在向中国宣传西方的科学、文化和宗教,促进西学东渐上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几百年的天灾人祸使这些书四散飘零,只有一小部分残留了下来,最后统归北堂。1958年这批西文图书转交给国家图书馆,其后三十年尘封未动,直到1987年国家图书馆迁入紫竹院新址后,才开箱清点。

一、北堂书的种类和册数

北堂书到底有多少?根据狄仁吉^⑥神父1862年所编的目录,有

5930册。据方豪记述1944年时尚有5千册以上:约3千册为教会书,2千册为科学书。1949年惠泽霖在书目中著录图书4101种共5133册。1988年国图研究馆员李镇铭的文章则说,国图1958年接收北堂书时,外文善本书与北堂书目核对,只少4本(笔者核查档案,见原始记载是只少3册)。后来善本部查点,数目却是3662种,5144册,少了439种,多了11册。最新的数字出于国图善本部馆员拓晓堂1993年的文章,为3663种,5144册。

不过这些数字并不可靠。先看总数。方豪、李镇铭和拓晓堂的文章中都有按文种的统计,现列表如下:

文种	方豪	李镇铭	拓晓堂
拉丁文	2826	2826	2426
法文	709	709	709
意大利文	409	409	409
葡萄牙文	214	214	214
西班牙文	126	126	126
德文	112	112	112
希腊文	55	55	55
荷兰文	23	23	23
英文	8	8	8
希伯来文	3	3	3
波兰文	3	3	3
斯拉夫语	1	1	1
补遗(法文)	2	2	2

总数	4491	4491	4091

它们都跟惠氏书目的总数不符。查方豪两篇文章提供的数字,在《北堂图书馆法文书及拉丁文书书目》中拉丁文书目为2426种,在《北堂图书馆藏书志》中则是2826种。李镇铭的数字显然沿袭《北堂图书馆藏书志》一文,而拓晓堂引用的则是《北堂图书馆法文书及

拉丁文书书目》。如果我们用《北堂图书馆法文书及拉丁文书书目》中的拉丁文书目2426种计算,三家的数字就一致了。但这仍比惠氏所说的4101少10种。经查,发现英文图书数量应是18种(编号4075-4092)而非8种。这样,惠氏所说的4101种就找到了下落。

依来源统计,经过查核,可以肯定地说,方氏、李氏和拓氏都是据惠氏书目中的《史略》得来的数字。虽然原来三家都有表,为避免烦琐,这里只列一份:

1	南堂:教皇保罗五世赠书	534 种	457 册
	圣劳瑞特(J.de S.Laurent)所有书	23 种	29 册
	原中国教区藏书	200 种	143 册
	后增加图书	546 种	738 册
2	东堂:		13 册
3	北堂:	202 种	290 册
4	西堂:	62 种	102 册
5	嘉乐主教藏书	51 种	69 册
6	索智能主教藏书	93 种	115 册
7	汤亚立山主教藏书	228 种	512 册
8	各地教堂,包括:		
	济南	75 种	82 册
	镇江	44 种	42 册
	杭州	31 种	35 册
	淮安	37 种	43 册
	南京	68 种	67 册
	正定		16 册
	开封	5 种	6 册
	上海		8 册
	武昌		6 册
	绛州	5 种	7 册
9	原属于遣使会藏书	39 种	75 册
10	来源不详的图书		2278 册

	共计		5133 册

原惠氏书目中的《史略》所列之表并无种数,只是在详述来源的章节中才分别指明种数、册数或并列种数和册数。把它们罗列成表始于方豪。后来两家文章一采用惠氏做法,一采用方氏做法。5133的册数符合惠氏对当时北堂书的统计。

最后说一说介绍北堂书的历家著述都会提到的金尼阁遗书,即所谓的明季西书七千部,它们在北堂书中究竟有多少?惠氏是最早比较详细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的人。他在《史略》中经过梳理目录,得出结论:“这三部份书(指教皇赠书、圣洛朗^⑦赠书和其他金氏携来书)合起来共有七百五十七种六百二十九册。”李镇铭没有细加探究,而是含糊其词道:“依据惠泽霖教士后来统计:教皇赠书保存下来的有534种457册;金尼阁由欧带回全部图书,现存757种629册。由此可见,当今北堂藏书中包括了七千部遗留下来的部分图书,这是毋庸置疑了。不过这些数字是否可靠尚待进一步核实。”拓晓堂则照搬惠氏的说法:“今保存在北堂书中的金尼阁遗书包括

教皇保罗五世赠书	534 种	457 册
S.J.劳瑞特图书	23 种	29 册
	200 种	143 册
共计金尼阁遗书为	757 种	629 册。”

真正对惠氏的统计做了核实的是方豪。他根据惠氏目录(凡金尼阁携来之教堂赠书,均注明Bibl. Trig.,不能确定、但惠氏个人判断必属无疑者,加问号),详列了金氏遗书的目录号,统计出的数字为确定者428种,有问号者151种。579种对757种,跟惠氏《史略》所记不一致。要注意的是,记载方氏这一统计的《明季西书七千部流入中国考》也有好几个版本。最初发表在1937年《新北辰》杂志第3卷第4期,1943年修改后发表在《文史杂志》第3卷第1、2期合刊上,1948年又修改后收入《方豪文录》,1967年第四次修正后收入《明史论丛》,最后一次修正是在1968年,收入《方豪六十自定稿》。最后一稿有这样一段话:“《方豪文录》在北平出版时,北堂图书馆目录尚

未出齐;民国四十一年(1952),又在巴黎惠泽霖神父处,获见更正与增补表;盖有以后发现者,有当初不敢确定而后确定者,……”所以他这一次统计的数字,比《方豪文录》那一稿分别多出确定者198种,有问号者12种。

综上所述,有关北堂书的种种统计都需要进一步核实,尤其是在惠氏编目之后又过去了50多年,北堂书又经历了多次搬迁的今天。

二、惠氏及其他人对北堂书的整理

从以上的描述可以看到,惠氏书目对整理、研究和利用北堂书至关重要。这本目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前言》介绍了目录编纂的缘起和经过,《史略》梳理了藏书来源和现状,再加正文和附录。《前言》至今未见中文翻译。不过我们发现方豪的《北堂图书馆法文书及拉丁文书书目》一文可以算是个概译。由于此文刊于1948年的《上智编译馆馆刊》第3卷第2期,一般人不易看到。现将相关部分照录如下,括号里的说明为笔者所加。

北平北堂(即西什库天主堂)图书馆为远东著名图书馆之一,藏有三百余年来中国天主教士所曾利用之各种书籍。凡教士所介绍之西方科学及有关宗教之书籍之底本,大多尚获保存至今,实为研究东西文化交流史及中国基督教史之宝库。惟北堂图书馆为教会私有性质,故以往并不开放,亦少整理,管理方面更未臻妥善,学者至感不便。

惟北平外国学者久已注意及此,渴望能及早整顿,改为现代化之图书馆,以便学者利用。乃由前美国大使馆秘书Mr.C. B. Lyon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向教会表达此意,前任北平主教满德贻(Mgr Paul Montaigne)与味增爵会(现通译为遣使会)会长德神父(Vanhersecke)即欣然同意,并共拟整理计划。最主要之工作有二:一为使图书馆有独立之建筑,一为编制最新

式之目录。关于第一点，教会方面立即让出一部分房屋为新图书馆之用，所有书架、书柜、阅览室及馆屋之修理、建置等费，概由教会担负。关于第二点，则由前任辅仁大学校长及圣言会会长雷冕司铎(Rudolph Rahman)接受办理，雷校长委其事于辅大教授Theodore Ruhl。而编印卡片及目录之费用，则曾获得洛氏基金(Fondation Rockefeller)之协助，此为前任燕京大学校长现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Dr. Leighton Stuart)、华语学校(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校长Dr. William Pettus、协和医院院长Dr. Henry S. Houghton与该院Mr. Trever P. Bowen所共同促成者。

二十八年(1939)一月开始编制目录；工作之繁重及困难，远出预料之上，因是稽延甚久。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工作遂不得不暂告中辍。是年六月，Ruhl司铎离华，乃由辅仁大学图书馆主任葛尔慈司铎(Joseph Goerts)继起工作，旋亦离去。时北堂图书馆馆长为惠泽霖司铎(H. Verhaeren)，原亦当送往潍县集中，但敌军因其患病，又以其为学者，遂得倖免。

在此艰苦时间，欧美各国消息已完全断绝，学术上之磋商及援助已不可再得，然惠司铎仍努力不懈，卒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出版北堂图书馆之第一部书目，即法文书目录。前任法驻华大使戈斯默(Henry Cosme)与法国领事Mr. Jean-Pierre Dubosc，对此均曾襄助。

由此可知，北堂书目的编撰工作上并非惠氏一人所为，还有辅仁大学的相关人员。另外，最初这个书目是分四册出版的。第一册法文书目出版于1944年，第二、三册拉丁文书目和其他文种书目出版于1948年，第四册《史略》和附录出版于1949年。现在流行的合订本则是1949年出版的(见参考书目)。

《史略》这部分乃是目前追踪北堂书源流的主要依据。李保华将其译成中文，嘉惠不识外文的学者，功莫大焉。曾耳闻北堂书目

有中文版,但未得见。疑是讹传。这样李译就是惟一的中文译本。这篇《史略》洋洋三万多字,所述多为几百年前的事,牵涉的人、事极为繁杂,实在不好译。李译中可商榷的地方不少。这里举出一些例子以供切磋。

一是外国人的译名。比如北堂图书来源的列表中,有“索萨主教”藏书一项。查原文此人是P.de Souza,有中文名曰索智能,字睿公,1697年生,葡萄牙人,1725年来中国,1740年12月17日任北京主教,1757年5月26日死于北京。以索萨(Souza, Sousa)为名来华的教士不少,音译容易混淆。同表中的戈维亚主教(A. de Gouvea)也是如此。方豪称他为汤亚立山(拓晓堂文称汤亚立仙),因A代表亚历山大(Alexander)。方豪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专家,精通多种语言,又是神职人员,他引用的称谓当较为可信。比如索萨,他就是用的索智能。又,叫戈维亚的著名传教士还有一个, Antonio de Gouvea,中文名为何大化,字德川,葡萄牙人,1592年生,1636年来中国,1677年死于福州。只音译而不注原文全名,极易产生混淆。

二是中国人名。比如惠氏提到最早述及金尼阁携西书七千卷来华的《代疑篇》、《代疑续篇》及其作者时,用的是韦氏拼音, Yang T'ing-yun, 李译为杨天簇、《代疑编》和《代疑续篇》。两个书名中的篇或编应当一致,这尚是小事,但“天簇”二字的所来却颇费我们猜想。杨氏在历史上算不得大名人,所以许多辞书并无记载,惟《辞海》有“杨廷筠”一条,说他是杭州人,字仲坚,号淇园。1557至1627年在世,做过不小的官,与徐光启、李之藻结交。入了天主教,竭力推广西学,协助传教。又查他人著述和书目,皆称他为杨廷筠,未见有“天簇”之称。Yang T'ing-yun这个名字在《史略》中凡两见。除了提到《代疑篇》的那一处之外,另外一处在第一章述说沈淮教案一事中,原文为“Micheal Yang T'ing-yun”,紧接着保罗·徐光启和列奥·李之藻之后,可知是同一个杨廷筠,只不过他跟徐、李一样有个英文名字。李译作“米歇尔·杨霆云”,与另一处所译完全不同,显然

是误认为两个人了。

三是文中出现的一些中文名字,其实是外国人的,然因不注明原文全名,也让人疑惑。细加追究,就发现了问题。《史略》第一章第三节“后来的获得物”中有这样一段:

1723年福建巡抚驱逐了本省的牧师。他的命令送到北京不仅得到批准而且蔓延到整个帝国。皇帝批准了这项命令,下令扣留所有传教士送往广州。

但是令人迷惑不解的是,北京的教堂照常开放,神父们也能够继续履行他们的职责。戴进贤和徐日升仍留在钦天监,为以后的工作制订许多计划。这是从1732年9月23日张诚神父致苏西神父的一封信中获得的证据。

这里的几个人名:戴进贤、徐日升、张诚,完全是中式姓名,然从上下文知应为西人。查原文,戴是Kogler,推测是Ingance Kogler (1680-1740),字嘉宾,德国耶稣会士,1717年到北京,任钦天监正29年,后死于北京,译文不误。徐是Pereyra。查近代来华传教士中叫徐日升者有二,一为Nikolaus Fiva,瑞士人,字左桓,1609年生,1635年来中国,1640年死于杭州;一为Pereyra Sancho,葡萄牙人,字寅公,1645年生,1666年来中国,1688至1694年间代理钦天监正,并重建南堂。因为《史略》这一节描述的正是有关钦天监的事,看来指的是这后一个徐日升了。可是据记载,他于1708年12月24日死于北京。1723年以后的事就安不到他身上了。所以这两个徐日升都对不上号。错译是因为原文只写姓,没写名。叫Pereyra或Pereira的来华传教士还有许多,其中有一个是Andre,或叫Jackson, Andreo,中文名为徐懋德,字卓贤,1689年生,英国人,1716年来华,1727年被任命为钦天监正戴进贤的助手(监副),1743年死于北京。笔者认为1732年张诚神父信中所提到的Pereyra应该是徐懋德。

这个张诚也有疑问。近代来华的传教士中确实有这样一个,字实斋,法国人,原名为Jean-Francois Gerbillon, 1654年生,1687年

到中国,1699年任法国北京住院的会长,又是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史略》下文所说张诚神父致苏西神父的信是耶稣会士亨利·贝尔纳从巴黎天文台德利勒的文件中发现的。或许是因为这一点,李译就将那封信跟这个张诚联系在一起了。然而张诚1707年3月25日死于北京,1732年显然不可能有信发出。查原文,惠氏用的名字是Gaubil而非Gerbillon。再查Gaubil乃宋君荣的姓,他名叫Antoine,字奇英,法国人,1689年生,1721年来华,1723年4月9日到北京,1742至1748年任北京法国住院的会长,1754年在北京建立了法国传教区的天文台,1759年死于北京。笔者以为《史略》中的Gaubil非宋君荣莫属,而不会是张诚。顺便说一句,发现这封信的亨利·贝尔纳, Henri Bernard,也是有中文名字的,叫裴化行。详见下文。

四是一些旧地名,如Wei-hsien,似应为潍县,即今山东潍坊市,而不是维县;Shao-chow似应为广东韶州,而非绍州,等等。

另外有些外文词的译法有误。比如,李译《史略》把宋君荣在北堂的职务librarian译成了图书管理员。这个词当然有图书管理员的意思,但多是在泛指职业的时候。如果在特指某一职务的时候,应视情况而定。比如美国大学图书馆馆长,就有叫做某某大学 Librarian 的。副馆长或助理馆长称 University Assistant 或 Associate Librarian。《史略》原文中这个词的首字母是大写,应该译作馆长。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惠泽霖身上。《史略》最后所署的职衔也是 Librarian,李保华也译为馆员了。方豪及其他人文章中都称他是馆长,就连刊载李译《史略》的《北京档案史料》之说明文字也称惠氏“1938年受命于北京主教出任北堂图书馆馆长”,应该说这才是准确的。

最后说《书目》的第三部分。这里我们采用拓晓堂的归纳,因为它相当准确完整:

这部目录著录项目完整,包括:

著者、著者生卒年、书名、出版者、出版地、出版时间;附录

项中包括:页数、尺寸、题记、签名、印章。部分稀见的图书还附有书影。从这些内容,读者大体可以掌握每一部书的基本版本情况。

在此目录的首尾,惠泽霖分别附有《北堂书的历史线索》(即《史略》)和人名索引、主题索引。尤其是附录的人名、主题两个索引,对于读者了解和使用提供了便利。

还要说明一点,主编这份重要目录的惠泽霖神父,到目前为止,除了这本目录,找不到其他有关的生平事迹。就连他是何国之人,目前也有两种说法。一说他是荷兰人。如方豪的《北堂图书馆藏书志》:“主编者:荷兰惠泽霖”;拓晓堂:“主持此项工作的是教会方面委任的图书馆长,荷兰人H.Verhaereu,即惠泽霖先生。”李镇铭也持此说:“……重新编制目录,由荷兰人惠泽霖教士主持其事。”想来他们都是沿用方氏的说法。然而方氏在《北平北堂图书馆小史》中又称“北平主教乃委法籍惠司铎H.Vernaeren为馆长……”,李保华译《史略》的说明也说“本文作者惠泽霖神父是法国传教士”,听上去他又是法国人了。至于他的生卒年,我们也没发现任何记载。最后的消息是由方豪传达的:1952年在巴黎还见过他。似乎是1949年后他回到巴黎,终老于斯了。

三、北堂藏书目录之流传

惠氏的目录编完之际,正是中国以及世界局势动荡之时。所以拓晓堂说,“这部目录仅在学界小范围内交流,其社会影响极为有限。”方豪的《北平北堂图书馆小史》则说,编目时曾将“各珍本书名页,摄成照片,汇同编目卡片、书本总目,分寄梵蒂冈教廷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及洛氏基金会。新编目录亦精印若干部,与世界大图书馆交换保存云。”这样看来,国内国外应该都有遗存者。经查,海外现藏有惠氏1949年英文版书目者有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杨百翰大学图书馆和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后者并藏

有一份微缩版。著录为Cameronics Micropublishing公司1990年制作,共八张胶片。

惠氏书目的1949年法文版未见著录,但有该版1969年的复印版。复制者为巴黎的Les Belles Letters公司,藏家很多。美国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圣迭戈分校、旧金山大学、华盛顿大学、耶鲁大学、西北大学、芝加哥大学、印第安纳大学、波士顿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杨百翰大学、威斯康辛大学。加拿大有McMaster大学。欧洲有伦敦大学、牛津大学,以及法国的E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s Bibliothécaires等。

这当然仅是不完全的统计。比如方氏提到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和教廷图书馆都不在此列。限于条件,我们无法查遍各地的图书馆目录。不过据现有资料,我们可以说惠氏书目流传不广。1949年版当然难得,1969年的复印版也不算多。

我们见到的藏于哥伦比亚大学的1949年英文版目录,内封和法文书目部分的扉页上有手写签名,因而知道该书原属富路特教授(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 1894-1986)。他出生在中国北京通州,他从1926年起任教哥伦比亚大学,一生著述颇丰,是海外中国史研究领域的泰斗级人物。1937年和1946年当过北京华语学校特邀讲师。这本目录或许是当时从中国带出去的。我们所见到的法文版目录是1969年的复印本,藏于威斯康辛大学。这法文版,经比较,除“序言”和“史略”两部分为法文外,在惠氏1949年的序言之后还附了一篇新序,署1969年1月21日, Henri Bernard-Maitre。这个人就是上文提到过的裴化行。他是法国传教士,1897年生。在天津津沽大学当过教授,后在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任职,直至解放后离华。他一生著述颇多,如《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士》、《利玛窦对中国的科学贡献》等。这一法文版的内封上有一方篆文“荣振华印”。因此知道复印的底本原属此人。他也是一个著名的近代来华传教士,原名Joseph Dehergne(1903-1990),1936年来华,1951年回

法国。这本书目想必是当时带回去的。他回法国后做过巴黎郊区尚蒂伊哲学院的图书馆馆长和法国教省的耶稣会档案馆的档案员,他和写序言的裴化行一起主持过三届国际汉学讨论会。他的著述很多,中文有耿升先生翻译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和《中国犹太人》。

四、相关研究

北堂书长期以来“养在深闺人不识”,就连书目也不易见到,对它们的研究利用就更不理想了。就目前可以找到的文献来看,最多的是对它们的介绍。比较早的也是最重要的自然要算惠氏书目中的《史略》。方豪教授这类文章共有三篇。其中《北堂图书馆法文书及拉丁文书目》主要是惠氏书目前言的概译。《北平北堂图书馆小史》对北堂书的源流有概括介绍,然不出惠氏《史略》的范围,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到当时(1944年)北堂尚有中文书约八万册,多为善本,一部分为清帝御赐,极其名贵。当年马相伯、英敛之、陈垣、徐润农、伯希和、非化则(疑是裴化行之误)等都经眼过。最重要的是他的《北堂图书馆藏书志》,对北堂书的历史、近况、目录、书的价值等都有较详细的描述,可以跟惠氏的《史略》互相参照。此文对明季西书七千部有简略考证。对中文善本,他也举出不少实例,让后人可略知梗概。不过这里他说中文藏书有2100册,跟上文所说的8万相差太多。

方氏之后,几十年中无人提起北堂书。近年的介绍文章中,杨宝华、韩德昌编的《中国省市图书馆概况》全然摘抄方氏的《北平北堂图书馆小史》。直到1988年李镇铭的文章、1993年拓晓堂的文章出现,才向世人披露了新的消息:1958年中国国家图书馆接收北堂书后,一直将其置于箱柜之内,未及清点。1987年它们随国图迁入紫竹院新馆,“在这所现代化图书馆中,全封闭书架,温度和湿度的空调系(统)、先进的防火系统,使这批珍贵的历史遗产得到最佳保

护。”拓晓堂还简介了其中一些珍贵图书的情况。

海外对北堂书的介绍并不多。笔者曾看到1969年荣振华以宋君荣的资料为基础,介绍十八世纪前期在中国的法国传教士藏书,即北堂图书馆藏书的文章。海外学者得以重新探访这批宝藏是1995年以后的事。首先是大英图书馆的Lars Laamann先生受伦敦大学资助,专门来华看北堂书。回去后他给伦敦大学写了一份正式报告,并在欧洲汉学图书馆员协会会刊上简要介绍了这次访书之旅的发现。文中他还提到“很偶然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楼内发现数目不详的部分北堂藏书。”在他之后,大英图书馆的Graham Shaw和Graham Hutt两位先生也来到国家图书馆,费时10天,专访北堂书。两位专家在后来的评价报告中指出:1.北堂书中早期欧洲印本图书之全,不仅在远东,而且在亚洲都是无与伦比的,其中包括11件手稿和4册摇篮本;2.北堂书具有书史研究价值。他们对北堂书的修复、装帧和编目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同年葡萄牙总统Mario Soares博士访华。该国使馆组织了一个书展,陈列了一些跟北堂书中版本类似的图书,以示中葡两国文化交流历史的久远。这次书展的目录由Manuel Cadafaz de Matos 编辑出版,十分罕见。

第二类文献是对北堂书的具体研究和利用。最早的也是方豪的。他的《明季西书七千部流入中国考》最初成稿于1937年4月,以后修订数次,至今仍是这个题目的权威考证。1947年他又写成《明清间译著底本的发现和研究》,列举了他在北堂书中发现的七种译著底本:《坤輿万国全图》、《奇器图说》、《名理探》、《进呈鹰说》、《狮子说》、《比例规解》和《浑盖通宪图说》。后来修订时又加了一种,即《寰有诠》。可以这样说,方氏是国内发现北堂书无与伦比价值的第一人。他在该文中还指出:“北堂图书馆是一个宝库,一块学术工作的新园地,现在能利用而研究的人,只有几位教会神父和极少数的教外学者,但可研究的还多。”并呼吁:“我们只希望在这方面有兴趣而同时有相当能力的人尽管来加以利用,加以研究,加以整理。”

他五十多年前的这一希望近年有了回声。1999年1月13日北京大学教授沈弘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她的见解:北堂书中有“摇篮本”! 据《哥伦比亚大百科全书》的定义,摇篮本是十五世纪中叶在欧洲用活字印刷的西文书籍,目前已知的约有4万种,分别由1千多家出版商制作,在世界印刷史上有重要意义。它们的基本特征是大4开本,牛犊皮包木板封面,正文中饰有红色大写字首和花边,书末有版本记录页但书首没有带标题的扉页。世界上收藏摇篮本较为著名的是欧洲的大英博物馆、牛津大学Bodleian图书馆以及巴黎、维也纳、罗马、米兰和布鲁塞尔等地的图书馆、美国的国会图书馆、哈佛和耶鲁大学图书馆等。中国以前没有发现过摇篮本。尽管方氏和拓氏都曾谈到北堂书中有摇篮本,但或是语焉不详,或是误听误记。沈弘从惠氏书目上的4101个条目中梳理出四种五册:《安哲罗全集》、《反异教大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著作》、《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沈教授的发现(请参见该报)令人欣慰,但是我们认为其研究成果也有应商榷修正和加以补充的必要。

第一,关于北堂书中有四种五册摇篮本的结论并不准确。沈弘所看到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著作》一书(3119/886,北堂排架号/惠氏目录号,下同)惠氏著录正文说是刊印于1517年,附录中提到此书的第一版才是1480年前后在佛罗伦萨刊印的(1sted. of Argyropulus version, Florence, ca. 1480)。沈弘先生似乎误读了惠氏目录。为了弄明白这一点,我们再次请教了大英图书馆的哈特(Graham Hutt)先生。前文提到,他曾来国图评估过北堂书,其报告中只提及三种四册摇篮本。哈特先生再次证实该书并非1480年版,如惠氏目录中的记载。另外一条证据是此书跟其他两本书惠氏目录769和1388号装订在一起,其“互见”条下都标明此书1517年刊印于巴黎。沈弘大约没有参阅这两个“互见”条目,而只发现此书跟《黄金著作》装订在一起,而漏了另外一本Questiones Logicese。《黄金著作》印于1518年而非沈弘所说的1517年。Questiones Logicese未

著录年代。这三本书印刷风格近似,如俱为双栏,单色的装饰性首字母,正文铅字分大小两等之类,似为同时代的产物。因此我们认为北堂书中的这一本《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著作》不是1480年印于佛罗伦萨的那一版,不属摇篮本。

第二,沈弘注明《反异教大全》有两个复本(3600/2948,3601/2949),但他只见到前一本。我们对比了两个本子,发现它们有这样一些不同:2948书品较好,2949曾浸过水,有4叶8面为手抄;2948高21公分,宽15.5公分,2949高19.5公分,宽15公分;2948首页有金粉底方框一,约2寸见方,以青、蓝、红、紫作花样图案,2949此处空白;2948每章首字母大写,用红、蓝两色勾出,并用金粉作底色,2949全为朱红色;2948无目录,2949有,共10页等。估计是它们尽管同时印刷,但制作者不同。又因际遇不同,它们现今各有各的价值,不能视为普通的复本。

第三,沈先生没见到的《安哲罗全集》高16.5公分,宽11公分,淡黄色羊皮包木板,重装过。正文四周原来写有密密麻麻的批注,据此可以看出被裁过。然原书大小已不可知。书口切成弧形,涂上了蓝色,有如现代形式。全书共527叶,卷首有前言和释例(Explicit tabula),正文510叶,双栏,标有叶码。每章首字母彩绘大写处留空。段落另起一行,但不缩格。其余两种摇篮本都不另起一行。卷尾有单色图案一,栏外小字注明此书于1492年印于威尼斯。又,该书有带标题的扉页,并有三条题词。可惜其中两条被涂盖了,否则它们或许可以提供某种递藏关系的线索。

第四,这三种四册摇篮本上都有同样的藏书印。沈弘的文章中有两处描述到这枚印。一是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著作》上,“最前面的空白纸上有两个醒目的圆形印章,其中一个带十字图形的是北堂图书馆的印章,上面的文字为法语。”一是在《反异教大全》上,“扉页上有一个带十字的印章,上面用拉丁语写有‘Bibliotheca Domus S.S. Salvatoris’等字样,可能它原属于某位西方传教士的私

人藏书。”我们所见到的带十字形的印只有一枚,即沈弘文中提到的第二枚,为拉丁文,其义按字面直译,约为“最神圣的救主之住堂图书馆”。除上述字样外,尚有“Peking”(北京)二字。耶稣会士视耶稣为最神圣的救世主,其居住之所即为教堂,所以这枚印应是教堂图书馆之印,而非私人藏书印。

对这三(四)种四(五)册摇篮本的考证研究只能算是一个起步,不敢妄言孰是孰非。沈弘的文章是国内最近对北堂书之研究利用的惟一实例,实在难能可贵。

在海外仅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以及日本两个机构藏有一本拉丁-葡萄牙-日文词典。该书是1950年根据北堂藏本复制的。其著录说原书是陆若汉(Jean Rodriguez, 1561-1634, 葡萄牙人,原在日本传教,1614年来华。曾助明作战,死于澳门)和其他耶稣会士于1595年编纂的。该底本仍在现存的北堂书中(3051/1182)。

五、结语

如果以1583年9月10日,利玛窦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广东肇庆算起,至今已有420年历史了。即使从他1605年8月27日建立南堂,启始北堂藏书的历史,至今也已近400年了。北堂书是世界走向中国、中西文化科技交流的重要见证,其文物价值和文献价值同样无比珍贵。我们谨以此文表示纪念。

如上所述,我们遗憾地看到,北堂书整理研究的现有成果很不理想。近年来,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的研究硕果累累,余三乐的《早期西方传教士与北京》、樊洪业的《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黄时鉴的《东西文化交流史论稿》等一批专著都很有分量。然而他们对北堂书以及相关的人、事都鲜有阐述。这次我们尽了一切努力搜集相关的文献资料,尽可能地给北堂书及其整理、研究和利用的历史与现状以准确的概括和客观的评估。由于这批书的多文种性质和长远历史,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把这一

回顾性的评价做得尽善尽美。本文意在抛砖引玉,希望与海内外方家切磋探讨。我们觉得,将惠氏的书目全文翻译,跟现存书籍加以核对,做出修正,将会是整理、研究北堂书工作的起点。这样一可以对这批书有个准确的统计和描述,二可以为研究和利用这批书提供可靠的入门指南。至于筹措经费、网罗专业人员进行研究则是更长久的规划。

惠泽霖教士50多年前写到:“对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来讲,这座图书馆成为东西方两种伟大文明汇合的媒介,这种汇合并非像唐朝和六朝那样的短暂,其间纵然有许多障碍,但这一切已成为给双方带来巨大利益的一种永久性的联系。”我们热切地希望看到这一宝藏能为东西方文明的汇合发挥新的作用。

注:

①惠泽霖(H. Verhaeren, 生卒年不详),原北堂图书馆馆长。

②方豪(1910-1980),原台湾大学教授,中西交通史专家。

③利玛竇(Matteo Ricci, 1552-1610),意大利人,1582年来华传教,死后葬于北京滕公栅栏墓地,今北京市委党校内。

④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法国耶稣会士,1611年来华,死于杭州。

⑤嘉乐(Giovanni Ambroyis Mezzabarba),亚历山大里亚城总主教,来华传达教皇的教谕,并与康熙帝谈仪式问题。

⑥狄仁吉(Jean Baptiste Raphael Thierry, 1823-1880),法国遣使会教士,1855年来华,死后葬于北京正福寺。

⑦圣洛朗(J. de S. Laurent),兰斯神学院院长、杜埃皇家学院希腊文教授,临终将藏书赠给弟弟带往中国。

参考书目:

①樊洪业:《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②方豪:《北京北堂图书馆小史》。《图书月刊》3卷2期(1944)。收入李希泌

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中华书局,1982,pp.524-530。

③方豪:《明季西书七千部流入中国考》。《方豪六十自定稿》。台湾学生书局,1969,pp.39-54。

④方豪:《拉丁文传入中国考》。《方豪六十自定稿》。pp.1-38。

⑤方豪:《明清间译著底本的发现和研究》。《方豪六十自定稿》。pp.55-62。

⑥方豪:《北堂图书馆藏书志》。《方豪六十自定稿》。pp.1833-1848。

⑦方豪:《北堂图书馆法文书及拉丁文书书目》。《方豪六十自定稿》。1969,pp.2399-2400。

⑧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⑨惠泽霖:《北堂图书馆目录》(H. Verhaeren. *Catalogue of the Pei-tang Library*. Peking: Lazarist Mission Press, 1949)(Multiple languages)。

⑩惠泽霖:《北堂图书馆史略》,李保华译。《北京档案史料》1989年第2期,pp.64-73;第3期,pp.84-87;第4期pp.68-73。

⑪黄时鉴:《东西文化交流史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⑫李镇铭:《北堂藏书渊源研析》。《图书馆学通讯》1988年第4期,pp.47-51。

⑬沈弘:《中国究竟有多少“摇篮本”?》。《中华读书报》,1999年1月13日。

⑭拓晓堂:《北堂善本书概述》。《北京图书馆馆刊》,1993年第3期,pp.110-118。

⑮杨宝华、韩德昌:《北平北堂图书馆》。见《中国省市图书馆概况:一九一九——一九四九》。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pp.84-5。

⑯余三乐:《早期西方传教士与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⑰约翰·罗列士:《北京北堂图书馆略史》。原出处不详,引文见《中国省市图书馆概况:一九一九——一九四九》。p.85。

⑱Calepino, Ambrogio; Rodrigues Girão, João: *Dictionarium latino lusitanicum, ac iaponicum, ex Ambrosii Calepini volumine depromptum ...* Tokyo: Toyobunko, 1950 (Latin)

⑲Dehergne, Joseph(荣振华); Gaubil, Antoine(宋君荣): *La bibliothèque des Jésuites français de Pékin au premier tiers du XVIIIe siècle*. 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969 (French)

(下转第 256 页)

⑥史金波:《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跋考》,《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3期。

⑦《元史》卷十八《成宗纪一》

⑧西田龙雄:《西夏语的研究》(二),西夏佛经。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205-211页。

⑨史金波:《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西夏文文献初探》,《敦煌研究》2000年3期。

⑩史金波、雅森:《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月。

⑪(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一八,技艺·板印书籍条。

⑫王静如:《西夏研究》(第一、二、三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年。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上接第 231 页)

⑬Dehergne, Joseph(荣振华)著,耿升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中华书局,1995。

⑭Lars Laamann.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Beitang Collection—Report from a Fact-finding Mission to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Bulletin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Sinological Librarians*. No. 9.

⑮Matos, Manuel Cadafaz de. *Intercâmbio cultural e científico entre a Europa e a China através do livro : sécs. XVI-XVIII*. Pequim : s.n., 1995 (Portuguese)

作者工作单位:李国庆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孙利平 中国国家图书馆